

渡江戰役

冷杰甫



福建人民出版社

渡江戰役

1949年4月



渡 江 战 役

冷 杰 甫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福州

渡江战役

冷杰甫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7.625印张 2 插页 159千字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60

书号：11173·117 定价：1.20元

鍾山風雨歇
青苔生石齋
師道江雲淡
誰知六律芳天
素韻地更復悠而涼
宜松柏重秀
此翁之德無以詣
不空虛寂寞
天君為我大先生
人間
一念是滌羣

前　　言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命运已成风中残烛。三大战役中国民党损失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个师，一百五十四万余人，残剩的一百多万军队分布在西起新疆，东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的战线上。这些部队分别困守在几个孤立地区，完全失去了在战略上的协同和有效的防御能力。在军事溃败面前，国民党军队的中高级军官认为前途险恶，一些人暗中离开军队，自谋出路。在政治上，南京政府已失去民心，在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民主运动高涨。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迭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纷纷提出责难。许多人离开国统区，投奔解放区。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经济崩溃。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下，蒋介石在朝不保夕的困境中，被迫宣布“下野”。

南京政府为了自己免遭灭亡，企图通过和平谈判拖延时间，同时积极部署沿江防线，妄图利用长江天险阻止我大军南下，以便在江南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卷土重来。这实质上是以和平谈判为幌子，借以继续维持其法西斯统治，阻挠人民革命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为了谋求和平，早日结束战争，使全国人民安居乐业，以极大诚意和耐心与南京政府举行了和平谈判。在中共代表团和南京政府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正式条文。这些条文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中一些反对内战希望和平的高级官员和将领们的共同愿望。但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小撮反动派，不承认自己的失败，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遂使和平谈判宣告破裂。

为了解放全中国，实现全国人民盼望早日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理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国共和平谈判破裂之后，肩负人民的重托，发起了横渡长江的战役。

渡江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以及部分地方部队，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的具体组织领导和指挥下进行的。连同武汉地区渡江的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在内，野战军和地方部队约有一百二十五万人参加此次战役。这个战役，战场辽阔，在从九江到江阴一千余里长的战线上展开。国民党军队企图以长江为天险，恃有利地形进行顽抗，阻止我军进军江南。许多地段战斗异常激烈，整个万里长江的中下游呈现一幅“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壮烈图景。在渡江作战中，我军指战员面对敌人大炮的轰击，火焰喷射器的熊熊烈火，轻重机枪疯狂的扫射，毫不畏惧，有我无敌，一往直前，用鲜血和生命打开了一条通往江南的胜利大道。渡江后，在苏皖浙赣广大地区追击作战中，指战员们为了追上和消灭敌人，忍受饥饿，不顾疲劳，跋山涉水，千里行军，克服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解放上海的战斗

中，为了保证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使上海能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指战员们不惜牺牲，用轻武器和拥有大炮的敌人作战。中国人民的许多优秀儿子，转战华东和中原的老英雄，把他们的鲜血洒在苏州河畔、白渡桥头。总之，在渡江作战中涌现了许多为解放全中国而战的英雄人物。英雄们的业绩如同长江的流水，与山川共存，偕日月同辉。

广大船工在渡江作战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船工们虽是老百姓，但实际上是不穿军衣的人民解放军。他们在木船上不避枪林弹雨，乘风破浪，稳操楫舵，一往无前，把解放军送上南岸，保证了渡江作战的胜利。

渡江战役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夜开始，至五月二十七日解放上海为止，历时三十七天，共歼敌四十三万七千余人。渡江战役的胜利，是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总前委正确组织和指挥的结果。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下，战斗在前线的总前委，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作战计划和作战方法，使得整个渡江战役进展顺利。在渡江作战中，人民群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因此渡江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

革命先辈在渡江作战中的献身精神，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极好教材。它将激励广大青年象革命前辈那样，为了革命的胜利，吃大苦，耐大劳，甚至在必要时为人民的幸福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今天，全国各族人民都要学习革命前辈这种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为革命，不怕流血牺牲，顽强拼搏的革命精神，献身四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	
一、和平谈判前的军事、政治形势.....	(1)
二、和平谈判的经过.....	(13)
三、真假和平的斗争.....	(28)
第二章 我百万雄师下江南	
一、商丘会议、贾汪会议和整编整训的开展.....	(38)
二、百万雄师下江南.....	(48)
三、船只的筹集.....	(54)
四、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传达和贯彻.....	(69)
五、水上练兵和渡江侦察.....	(77)
第三章 突破长江天险	
一、我军渡江作战的任务及兵力部署与敌军 江防态势.....	(94)
二、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和平条件 毛泽东、朱德 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113)
三、突破敌军荻港防线 万里长江第一船.....	(117)
四、切断汤白联系.....	(124)
第四章 占领南京	
一、敌在南京以东的江防配备和我东路大军的作	

战任务	(137)
二、激战乌苏港 敌江防彻底崩溃	(141)
三、敌江阴要塞官兵和第二江防舰队起义	(147)
四、粉碎帝国主义的干涉企图	(155)
五、解放南京	(157)
六、乘胜前进 追歼逃敌	(162)
第五章 进军武汉	
一、保卫武汉 迎接解放	(182)
二、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南下武汉	(188)
三、国民党第十九兵团起义	(190)
第六章 激战上海	
一、敌人的防守及其对上海的大破坏、 大屠杀	(199)
二、我党我军为解放上海所做的准备和部署	(205)
三、分进合击 外围歼敌	(212)
四、总攻市区 解放上海	(222)
五、巩固胜利 管好上海	(228)
第七章 渡江战役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	(231)
后 记	(235)

第一章 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

一、和平谈判前的军事、政治形势

在我军即将发起渡江作战，准备进军江南解放全中国的时候，国民党政府的总统蒋介石发动了和平攻势，提出了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中国共产党洞悉国民党的“和平”阴谋，但从实现真正和平、减少人民痛苦的良好愿望出发，和国民党南京政府进行了为期二十天的和平谈判。最后和谈破裂了。“和平”谈判的破裂，完全是蒋介石坚持独裁统治，坚持内战政策的必然结果。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政府敢于发动内战，是凭借手中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有海、空优势，有外国侵略势力的支援。南京政府企图依靠军事实力和海、空优势，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但是与南京政府的愿望相反，军事形势的变化，不以它的意志为转移，而是按照历史的逻辑，按照人民的逻辑发展。解放战争的第一年（一九四六年七月——一九四七年六月），人民解放军即消灭国民党军队

一百一十二万人。解放战争的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七月——一九四八年六月），又消灭国民党军队一百五十二万一千四百人。经过两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国民党军队开始由优势转为劣势，而人民解放军则由劣势转为优势。到了解放战争第三年的上半年（一九四八年七月——一九四九年一月），人民解放军经过了包括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在内的一系列战斗，仅半年时间就消灭敌人达二百三十一万八千人。这样，在两年半时间里，总共消灭敌人四百九十五万九千四百人。很明显，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经被迅速消灭。剩下能作战的部队，只有一百三十万零八百人，分散在西起新疆，东到台湾的漫长战线上。以胡宗南为主任的“西安绥署”，掌握着十三个军约十八万余人，扼守在西安为中心的几个孤立地区。以张治中为主任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掌握着十七万二千人，配置在荒凉的大西北。这两个集团被我人民解放军的第一野战军紧紧地钳制着，不能构成有效的防御阵线。以白崇禧为长官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拥有十一个军约二十五万人，配置在北起明港，东至九江，西至岳阳的长江两岸。以宋希濂为主主任的“湘鄂西绥靖区”，掌握着五个军约十万人，配置在宜昌，沙市为中心，东至岳阳，西迄巴东的长江两岸。以程潜为主主任的“长沙绥靖公署”，掌握着四个军约五万人，配置在长沙、衡阳、株州地区。以余汉谋为主主任的“广州绥靖公署”，掌握着五个军约八万人，一个军驻在琼崖，其余的配置在以广州为中心，以五岭山脉为依托的广大地区。长江以南的华东地区，主要是汤恩伯集团。国民党政府为了阻止我军渡江，把希望全寄托在汤恩伯身上。为了加强汤恩伯部的力量，成立了“京沪杭

警备总司令部”，让汤恩伯充当总司令。但汤恩伯手中只有七十四个师约五十万人。其中五十四个师配置在西至湖口，东至江阴约五百公里漫长的长江沿岸和上海地区。另有二十个师作为第二线兵力配置在浙赣线沿线。从敌人兵力的配置来看，有这样几个明显的弱点：第一，敌人兵力少，而且很分散。第二，敌人兵力的布防，已经没有完整的战线，不能构成有效的防御体系，只是盘踞着孤立的几个据点。西北地区，敌人据守着太原、西安等地。华北地区，敌人据守着归绥、安阳、新乡等地。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和华东地区，敌人仅有乌衣、浦口、安庆三个大据点，长江两岸的华中地区，敌人据守着武汉、宜昌、成都地区。第三，敌人各自为战，集团之间失去协同。张治中集团有明显的亲共倾向，和反共的胡宗南集团不可能联合作战；白崇禧的防区和胡宗南的防区虽然靠近，但是存在着桂系和蒋系之间的矛盾；白崇禧的防区和汤恩伯的防区，虽然是生死攸关的结合部，但是同样存在着桂系和蒋系之间的矛盾。第四，此时敌人不仅兵力分散，而且战斗力较弱。胡宗南的部队和白崇禧的部队，虽然没有遭到致命打击，但也已成惊弓之鸟。汤恩伯的部队不少是由东北战场、淮海战场和华北战场上撤逃下来的残部组编的，战斗力都较弱。这四个弱点说明敌人的武装力量，从战略上讲，已经不能和人民解放军抗衡了。既不能组织进攻，也不能进行有效的防御。彻底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

和敌人的情况相反，我军在结束了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之后，华北、中原和华东的解放区已经联成一片，解放区人口达一亿九千多万。由于开展了清匪反霸和土改运动，解放区日益巩固和扩大，社会秩序日趋安定。千百万人民群众踊

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已发展到三百多万人，进攻的矛头一直伸展到长江沿岸。

在敌人遭到毁灭性打击，我军迅速壮大的形势下，靠残存的军事力量维持摇摇欲坠的反革命政权的南京政府，不仅威信一落千丈，而且引起军界内部高级将领的纷纷责难和不满，甚至公开指责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的失败，是蒋介石用人不当和指挥无能的结果。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通过新华社发表了第一批头等战犯四十三人的名单，并声明全国人民要惩办这些发动内战而如今被人民解放军打败了的战犯。这批战犯名单都是蒋介石的高级将领和死硬派。头批战犯名单公布以后，在国民党的军界和政界，引起极大的惶恐。国民党的将领们这时的表现有三种状况：第一种是，眼看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势不可挡，在这种灭顶之灾即将到来的形势面前，表现为意志消沉，对蒋介石的埋怨和责备溢于言表。当时南京卫戍副司令覃异之写下这样一首诗：

“隔江烽火逼京都，立马中原负霸图，惆怅秦淮拼一醉，自来难得是糊涂。”第二种是，想方设法投靠人民，冒着生命危险组织起义。在渡江战役和渡江以后的作战中，组织起义，弃暗投明的不乏其人。第三种是，纷纷脱离国民党政府，或解甲归田或远渡重洋，到国外寻求避难所，发誓永远脱离军界，另谋生路。

这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遍及南京、上海、武汉、杭州、南昌、广州等地。大学生、中学生、中小学教师、教授等知识界人士都参加了这一斗争。四月一日，南京地区十一所大专学校的学生六千余人，反对国民党的假和平，高喊“反

饥饿”“争生存”“要民主”“要真和平”等口号，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国统区广大农村民变蜂起，在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四川、云南、广东、广西和陕西等地，民变斗争达到高潮。有的组织人民革命军，参加游击队，使我党领导的南方游击队迅速发展壮大。到一九四九年上半年，江南游击队已发展到五万三千人，活动于十个省的广大地区。建立了苏南、皖南、闽浙赣、闽粤、湘鄂西、川西、桂东、琼崖等革命根据地。

与此同时，民族资产阶级公开转向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中间阶级的代表人物，社会贤达，有名学者和知名人士等络绎不绝地奔向解放区。一九四九年一月，先后有李济深，沈钧儒等五十五人奔赴解放区。他们到达解放区以后，于一月二十二日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表示“愿在中共的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①

以上种种情况说明了南京政府的内战政策已经无法继续下去，已经到了众叛亲离不能维持的境地。“在此种形势下，为着保卫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以求达到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的目的，”^②南京政府不得不提出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

在人民解放军巨大的军事打击面前，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更加激化，派系斗争更加激烈，这是蒋介石提出“言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在所谓实行“行宪”以后，即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到五月的总统、副总统选举以后达到了高潮。蒋介石把一九四八年定为“行宪年”。所谓

“行宪”，就是选举总统，实行总统制，按照所谓“新宪法”实行统治。

蒋介石的头衔原是国民政府的主席。作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怎么不当主席要当总统呢？这种改变并不是蒋介石想过总统瘾，而是来自美国杜鲁门政府的主意。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对此，杜鲁门政府是支持的。但支持有个条件，就是蒋介石政府必须实行美国资产阶级式的“民主”，以符合美国反动当局在中国殖民利益的需要。因此，马歇尔在调处当时国共两党的停战失败以后，就催促蒋介石打着“还政于民”的口号，实行所谓“行宪”，用这一套虚伪的口号和作法，来欺骗广大人民，企图取得人民的支持来和共产党打内战。

蒋介石本来是想通过选举总统，玩弄假民主的手法，来获得人民的信任，提高其政府的威望，以利对共产党作战。结果适得其反，在总统选举中及选举后，蒋介石政府的中央和地方矛盾，CC系与三青团及复兴社的矛盾，蒋系和桂系的矛盾，迅速表面化和白热化起来。这些矛盾中，蒋系和桂系的矛盾最为尖锐。这种矛盾的发展对国民党的和谈活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起了一种推动的作用。

蒋介石和桂系的矛盾，具体表现为蒋介石和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之间的矛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们之间矛盾根子很深，错综复杂。矛盾的激烈化，表面化则是在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这个重大政治事件中表现出来的。

对于李宗仁参加副总统的竞选一事，桂系的首脑人物和将领们起初并不十分热心。认为由于蒋介石的霸道，竞选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用不着费那么大的劲，花那么多代价，去

做徒劳无益的事。即使李宗仁当上了一个有职无权的副总统，和蒋介石一起共事，也只能成为蒋介石的一个“副官”。因此，参加副总统竞选，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倒不如独占一块地盘，对桂系的“事业”更为有益。但李宗仁则执意参加竞选，希望参加政府，刷新政治，“挽狂澜于既倒”，颇有一番雄心。李宗仁认为，他在北伐时期就担任过第七军军长，后来又当了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当时的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现在要做大总统，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在国外，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不参加竞选，现在只有他有资格参加竞选副总统。和蒋介石的独裁政治不一样，李宗仁对待幕僚和对待各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对待社会贤达，以致在某些情况下对待社会群众，都有一种“礼贤下士”的民主姿态，夺得了统治集团中“民主派”象征的称号。这一点也是推动李宗仁积极参加竞选的因素。此外，美国当局对李宗仁的支持，是他决意参加竞选的决定性条件。

蒋介石对李宗仁竞选总统是十分不满的。对美国支持李宗仁这一点，蒋介石和他的亲信幕僚们尤其嫉妒。在蒋介石看来，李宗仁如果选上了副总统，将来必定会分庭抗礼，对蒋介石政权必定会带来威胁。因此，蒋介石暗中决定，支持孙科竞选副总统。作为太子派首领的孙科，当时是国民政府的副主席（主席是蒋介石），又是孙中山的儿子，如果孙科选为副总统，既可以增强国民党政权的威信，政治上反共的孙科，又是蒋介石反共的一个理想合作者。因此蒋介石不惜大量的金钱，帮助孙科竞选。选举过程中蒋介石亲自出马，一方面对李宗仁进行诋毁，另一方面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找文武官员面授机宜，替孙科拉选票。由于蒋介石选举中进